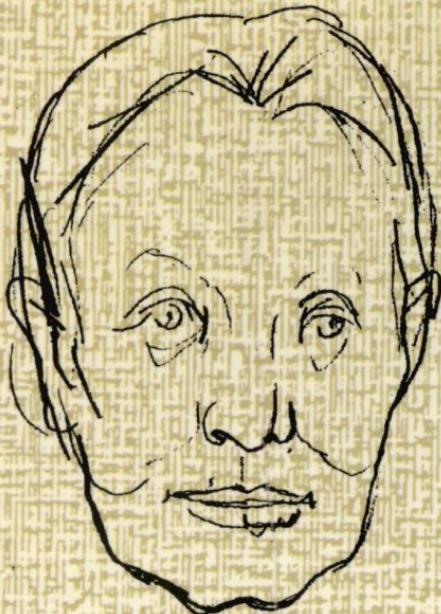


冰心全集



冰生下辛亥年七月，也就是1901年4月
就离开家改了福州，到了上海。

那时我的父亲是海防巡洋舰的副舰长，
长官是桂永清先生。冰口述得西洋舰的白字
上校，就是“少校”、“中等”、“海佐”、“见习”
军衔，以前跟着父亲上去了，叫“学生”。
夏天时，因为舰长驾驶技术差，触礁沉没于
海上。

上海是个大港，一连三晚是大火，
船家经过沉没九天，因此他们回了一次
南京，住在上边小岛上。这岛里头
的哪一区，我老不知道了，但是当沙叫
着那很土气底的故事，倒也真有兴味。



豪华珍藏本



冰心全集



豪华珍藏本

海峡文艺出版社

冰心全集

第四卷

(1950—1957年)

卓如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冰心(前排右二)1953年在印度大使馆的招待会上



冰心为采访的儿童们讲故事



中印友好协会访问团在印度



妇女合影
冰心(左二)访问印度时，与印度



1955年，冰心在日本



1955年8月，冰心（二排中）参加中国代表团到日本出席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前为廖承志，第三排左为赵朴初，摄于东京羽田机场。

目 录

1950 年

从破旧的信说起

- 在东京大学讲台上 (3)

1951 年

诗人与政治 (7)

为了中日的永久和平

- 临别寄东京大学学生 (24)

1953 年

归来以后 (29)

莫斯科的丁香和北京的菊花 (31)

1954 年

与小朋友谈访印之行 (37)

印度之行 (41)

我得了一条红领巾 (62)

我参加了一次动人的会见 (66)

学习宪法草案的体会和感想 (69)

《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 (72)

回忆我在印度的日子	(73)
友谊的展览	(79)
伟大的保证，伟大的关怀	(81)
《印度童话集》	[印度]穆·拉·安纳德著(85)

1955年

我看了《一个女人的新生活》	(137)
《吉檀迦利》	[印度]泰戈尔著(141)
我控诉	
——看了日本电影《混血儿》以后	(187)
印度重游记	(191)
好妈妈	(197)
一人一篇	(202)
访日观感	(206)
广岛——控诉的城市	(211)
值得同情的遭遇	
——印度电影《流浪者》观后	(218)
应该是赶紧动手的时候了	(221)
日本纪行	(223)
《广岛姑娘》	(235)
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妇女	(239)

1956年

陶奇的暑期日记	(245)
一个母亲的建议	(318)
“一位专家，几万儿童”	(323)
还乡杂记	(328)

《喀布尔人》	〔印度〕泰戈尔著	(356)
《弃绝》	〔印度〕泰戈尔著	(365)
《素芭》	〔印度〕泰戈尔著	(373)
《许愿的夜晚》	〔印度〕安利塔·波利坦著	(379)
《我写歌》	〔印度〕安利塔·波利坦著	(381)
《一封信》	〔印度〕安利塔·波利坦著	(383)
给国外华侨小朋友的一封信		(385)
一个埃及的引水员		(388)
勇敢地向前吧,埃及的弟兄姐妹们		(390)
《先知》前记		(393)

1957年

小桔灯		(397)
一个渔村女教师		
——介绍日本小说《二十四颗眼珠》		(400)
1956年《儿童文学选》序言		(405)
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		(412)
观舞记		
——献给印度舞蹈家卡拉玛姐妹		(415)
别踩了这朵花		(418)
试谈短篇小说		(420)
西郊短简		(421)
从“到此一游”说起		(425)
我们拜访了火星		(428)
《泰戈尔诗选》	〔印度〕泰戈尔著	(430)
我的秘密		(538)
《萨·奈都诗选》	〔印度〕萨洛季妮·奈都著	(543)

国庆寄语海外的母亲们.....	(554)
莫斯科的上空.....	(557)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560)
第二颗人造卫星.....	(562)
“面人郎”访问记.....	(564)
向埃及人民致敬.....	(570)

1950 年

从破旧的信说起

——在东京大学讲台上

我从幼年时候起就知道著名的“红门”了。——这“红门”日语叫“赤门”。亲戚或长辈中来过日本和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人们，都是夸耀自己的“红门”出身的，可见东京帝国大学的地位——它已在外国人中有相当高的评价了。

我自己在四年前就到过东京，首先参观的是东大。那郁郁葱葱的林阴道，庄严古雅的校舍，那许多往来的学生，都使我心中不觉涌出兴奋而愉快的感情。

前年夏，应东大中国文学科的聘请讲学，我感到荣幸。今春又再次被邀请来讲学。我不止是最早来的外国女性，而且也是最初在东大讲学的外国妇女，这更使我感到兴奋。

我从事教学有二十多年了。对我来说，最令人愉快、令人振奋的，莫过于接触男女青年。过去的同事和我这样说：

“我们教师过去没有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那时也不可能。但是今后，我们应当努力引导学生的思想走向正确的方向。”

我记住了这句名言。在过去二十年的经验中，学生们给予我无数的激励，无数的劝勉和无数的批评；他们是那样的热情，那样的严谨，那样的坦率和天真。这给了我勇气，使我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们希望我不要停止，不要后退。特别在抗战期间，学生们对我的照料和关怀，给我以无限的鼓励和鞭策。记得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〇年）春，在华北的广播中说我故去了，据说日本报纸也登载了

这样的消息。在此三四个月之后，我的丈夫吴文藻收到了在华北打游击的一位学生的信。这信不知经过了几个月，通过了几个战区，才辗转送来的，当拿到信时，已破旧不堪了。

这信中写道：

“在战地，有位外国记者送我一本‘幻想评论’，其中记载有谢先生故去的新闻，我们无限悲伤。我还清楚地记得，谢先生喜欢穿蓝布衣服，谢先生的那温柔的笑脸……谢先生一直是主张民主、拥护民主的，现在我们正需要建设最民主的时候，她却突然离开我们去世了，我们怎能不悲痛呢！我们希望与您和您的孩子一起，为完成谢先生未完成的大业而努力……”

这封信使我感动，使我伤心！我多次地流下了热泪。以后这个学生在华北战场上壮烈地牺牲了；而我仍留在人间。但他对我所怀的印象和深挚之情，却长久留在我的心里。我该如何去努力呢！

我在东大的教室和校园里，看到这儿的学生的脸上表情和眼睛里的神情，和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完全一样。同样是朴素的服装，饱满的热情，追求知识的眼神，敏捷天真的动作；同样地激发了我。遗憾的是因我没有学过日语，不能随意畅谈。我对日本一切的理解，实在肤浅薄。如果我能和学生们随意畅谈，我相信能有更多的东西贡献于诸位面前。亚洲的和平和民主，是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中日两国国民需要我们真正的理解与合作。

我们追悔过去沉痛的教训，需要重新展望未来！东大的学生们以我做为“红门”的客人接待，我希望在得到互相理解、共同合作的良机中不断前进！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日东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东大学生新闻》1950年10月26日。）

1951 年
